

黔东南州“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数字化转型的现状、瓶颈与需求分析

□ 舒尧香 王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体系革新。近年来,黔东南州深耕本土基层治理实践,不断健全“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的基层治理机制,推动“党小组+网格员+联户长”的铁三角治理架构,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十四五”期间,全州通过综治系统平台累计流转办理各类矛盾纠纷54.9万余件,办结54.2万余件,办结率达98.7%,数字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支撑。但从落地运行的实践调研来看,受山地基础设施短板、跨部门数据孤岛、基层数字人才储备不足、数字化产品本土场景适配度低等多重因素制约,当前数字化转型整体仍处于要素应用阶段,尚未完成治理架构、数据体系、运行模式、治理理念的系统性重塑,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些难题,推动机制优势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助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质增效。

一、黔东南州“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数字化转型现状

（一）构建四级联动数字架构,实现治理组织全域覆盖

目前,黔东南州、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已全部实体挂牌运行,机构、人员、场地、经费、制度“五有标准”基本落实,建成集接待调解、研判指挥、法律服务、诉求处置于一体的基层治理中枢阵地。网格单元划分兼顾城乡差异:城市社区细化为1705个城市综合网格;乡村依托自然寨、村民小组划定基础网格,按照每10—15户设置十联户联动单元,推选联户长承担民情收集、隐患排查、邻里调解等末梢职责。依托定制化线上治理架构,全州11.7万余名网格员、联户长、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一纳入数字化组织体系,实现人员线上编组、任务一键派发、消息定向推送、工作台账云端留存,完成线下治理组织体系向线上数字化体系的迁移。

（二）搭建多层次数字平台矩阵,夯实治理数据支撑底座

现阶段黔东南基层数字化平台已形成“省级通用平台+州级调度中枢+县城特色系统”三层架构并行的数字工具矩阵。省级层面依托贵州省综治信息平台、“平安贵州”APP,承载人口信息采集、隐患事件上报、矛盾纠纷台账管理、重点人群管控等基础业务;州级层面依托城乡运行管理中心搭建全州治理数据底座与数字驾驶舱,汇聚公安天网、雪亮工程共计4万路公共视频监控资源,整合公安、气象、应急、文旅、市监等部门超过5000万条政务数据,为各县市综治中心

开展全域态势研判、跨区域调度提供数据支撑;县域层面立足地方治理需求打造本土化特色应用。

（三）再造线上闭环业务流程,实现民情事项全链条处置

目前,全州已普遍建立“联户长排查上报—网格员核实验验—综治中心工单派发—职能部门分类处置—群众反馈评价—平台归档溯源”的标准化线上处置流程。联户长扎根村寨末梢,依托微信群、移动端APP收集山林火情、道路隐患、邻里纠纷、留守群体困难等一线信息;网格员赴现场核验信息后上传至综治平台;综治中心按照事项类型,一键分流至公安、司法、应急、林业等责任单位限时办理;事项办结后由当事人线上反馈满意度,全部流程线上流转,全程留痕、随时溯源。

二、黔东南州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现实瓶颈

（一）政务数据壁垒突出,平台碎片化制约全域联动

一是部门业务系统独立运行、数据互通难度大。公安人口台账、民政特殊人群档案、市场监管商铺信息、林业山林地块、应急隐患台账分属不同业务系统,各系统建设标准不统一、端口开放有限。二是州级大数据底座虽汇聚海量政务数据,但县级综治中心难以一键调取完整跨部门信息,网格员不得不在多个系统重复录入相关信息台账,多头填报加重基层负担。三是县域特色平台繁杂,碎片化问题突出。各地分别开发平安黔州、贵和码、数字乡村、村级钉钉台账等独立工具,平台之间互不兼容。网格员日常工作需要切换3—5个移动端软件上报信息,省级综治平台、地方小程序、微信群台账并行运转,造成数据重复采集、信息孤岛。

（二）城乡数字基建不均衡,硬件短板限制智治落地

一是受山地地形制约,城乡、坝区村寨与深山村落基础设施差距显著。偏远高海拔村寨网络信号不稳定,网格员进山开展隐患巡查时终端信号中断,隐患信息无法实时上传,离线上报功能不完善,影响一线处置效率。二是监控点位布局不均衡,县城、乡镇集镇、热门旅游村寨视频监控设施完善,深山传统苗侗寨、林区、水库、地质灾害点位智能探头不足,部分已布设监控长期暴露在户外复杂环境,设备损坏后缺乏及时维修,硬件资源闲置浪费。

（三）治理队伍数字素养差距大,人才梯队支撑不足

网格治理队伍一般由专职网格员、村级干部、联户长三类群体构成,数字化能力差距突出。专职网格员平台操作能力相对熟练,但普遍身兼数职,承接民政、

防火防汛、乡村振兴等十余条线任务,大量精力被行政事务挤占,难以深耕数字化治理应用。村干部中年群体占比高,对大数据平台、智能监控、线上工单系统操作生疏,数字化统筹调度能力不足。联户长多由普通村民、老党员、寨老志愿担任,人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有限,很多中老年联户长无法熟练操作智能手机APP,仅依靠电话、微信群语音上报隐患,致线上台账更更新慢、信息格式不规范。

（四）体制机制建设不完善,数字化运行缺乏长效保障

一是线上工单权责边界模糊。综治中心收到群众诉求后,部分跨部门复杂事项容易出现推诿、工单流转卡顿现象。二是数字化配套考核激励制度缺失。网格员、联户长线上隐患排查、民情处置工作缺少配套薪酬、积分奖励机制。三是线上线下融合深度不足。部分地区简单将数字化等同于线上填报台账,纸质网格台账依旧并行,有的出现“重线上打卡、轻实地治理”的形式化困境。

三、推动黔东南州“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

（一）推进平台一体化建设,打通数据壁垒,构建全州统一治理中枢

一是推动政务数据端口有序互通。依托州级大数据中心,向各县市综治中心开放公安、应急、林业、市监等部门数据共享权限,实现人口信息、重点人员、风险隐患、房屋台账一键调取,破除跨部门数据孤岛。二是健全数据共享会商机制。统一数据采集与统计口径,统筹整合各县独立建设的数字乡村、平安监控、便民小程序,打造黔东南一体化基层治理移动端终端,网格员、联户长依靠单一APP完成隐患上报、工单接收、台账更新、政策接收,解决多软件来回切换的问题。三是完善十联户末梢数字信息通道。在治理终端增设联户长简易上报入口,支持语音、图片一键上传,适配中老年联户长操作习惯;增设线上联户议事板块,激活十联户单元群众自治功能。

（二）均衡升级数字基础设施,补齐深山村寨山地硬件短板

一是优先推进山区通信网络提质。联合通信运营商完善偏远苗侗村寨、林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基站、宽带网络与村级公共WiFi建设,解决深山网格巡查信号中断难题。二是科学优化智能监控点位布局。在传统村落、山林卡口、水库、地质灾害隐患区增设AI智能探头,搭建火情识别、山洪预警、村寨烟火监测自动预警系统;建立专职巡查队伍,落实监控设备定期检修制度,盘活存量硬件资源。三是持续完善村级综治中心硬件配

置,争取省级数字政府、基层治理专项资金,为行政村配齐治理大屏、办公终端、应急广播、音柱设备,打造集视频调度、民情研判、政策播报于一体的村级智慧治理阵地。

（三）实施分层精准技能培训,培育复合型基层数字人才队伍

一是构建“网格员—村干部—联户长”的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面向专职网格员,开设大数据平台实操、隐患研判、工单处置专项课程,持续精简网格多头行政任务,落实基层减负;面向村干部开展数字乡村、智慧监控、线上调度常态化培训;面向高龄联户长,开设简易手机操作、语音上报、微信群民情收集等基础教学,配套苗侗双语教学资料。二是组建州县两级技术运维专班,承担辖区平台管理、监控维修、系统优化等工作。三是建立大数据人才下沉机制,健全激励晋升机制,鼓励大数据专业人才、年轻村干部参与村寨数字化网格工作,搭建稳定的基层技术人才梯队。

（四）构建长效运行机制,打通线上线下双向融合治理闭环

一是厘清线上工单部门权责清单。针对山林权属、民族纠纷、旅游矛盾等高频复杂事项,建立多部门线上联合研判机制,明确牵头、配合单位职责,建立联合会商、联合处置、跟踪督办机制,防范工单空转、部门推诿。二是完善网格数字化考核激励制度。将矛盾化解实效、隐患整改成效、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弱化平台填报数量考核,杜绝台账造假、形式主义填报。三是坚守“线下排查为基、线上工具赋能”的定位,明确数字化平台仅作为民情登记、调度指挥载体,网格员、联户长入户走访、邻里调解的线下工作不能被线上打卡替代,构建“线下排查—线上流转—线下处置—线上反馈”双向融合治理闭环,推动数字治理和传统基层治理有机融合。

（五）健全基层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筑牢民族地区群众信息防护底线

网格化平台采集全州实有人口、特殊群体、家庭住址、矛盾纠纷等海量敏感基层数据,必须建立严格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一是规范网络信息查阅权限,落实分级访问管控,严防人口隐私数据外泄;规范网格员信息采集标准,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二是完善平台网络安全防火墙,建立操作日志审计制度,常态化开展基层人员数据安全培训,规范信息采集、存储、使用全流程管理,守住基层群众的数据安全底线,实现数字发展与安全保障统筹推进。

（作者单位：中共凯里市委党校）

在云贵高原的褶皱深处,贵州曾长期被发展的历史叙事定格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边陲之地。这种源于明清时期的地理学想象,在西方传教士的游记中被建构成某种“东方主义”式的文化符号,最终演变为制约区域发展的刻板认知定式。但当我们将目光投向1935年的乌蒙山间,在遵义会议会址斑驳的木楼里,在四渡赤水激荡的浪涛声中,一个全新的象征体系正在破茧而出。这种从“地理边缘”到“革命转折点”的象征符号内涵嬗变,不仅改写并提升了贵州的文化象征品位,还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叙事中持续释放着发展动能,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符号内涵重构与区域发展互动的绝佳样本。

一、历史褶皱中的“刻板印象”建构

在《黔书》与《续黔书》的墨香里,明清封建文人对贵州的地理学想象逐渐固化三重困境:一是经济困顿的“人无三分银”,二是地理阻隔的“地无三里平”,三是气候潮湿的“天无三日晴”。这些“三无”意象经由法国传教士古伯察《中华帝国游记》的渲染,在近现代视野中形成了更具殖民主义色彩的“未开化之地”想象。1910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人类学调查虽带有科学考察的表象,其“蛮烟瘴雨”的记述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他者叙事。

“三无”刻板印象作为贵州曾经的象征符号内涵,在地方治理层面对贵州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末民初的云贵总督李经羲曾奏称:“黔省地瘠民贫,非开矿不足以资倡注”,将资源开发视为破解困局的唯一路径。1914年《贵州实业杂志》的创刊号数据显示,全省工业资本总额仅占全国的0.37%,这种经济边缘地位与“刻板印象”建构形成互为因果的闭环。

“三无”之地这一刻板印象作为负面的象征符号在文化场域中得到持续发酵。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期间,当北京、上海的文人热议“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 科学)时,贵州知识界仍在为破除“夜郎自大”的污名化标签而挣扎。1930年《黔铎》杂志的调查显示,在省外就读的大学生中76%羞于承认贵州籍贯,这种文化自卑折射出符号暴力对群体心理的深层侵蚀。

二、转折时刻的符号内涵嬗变

1934年冬,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时的情景,构成了象征学派人类学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1920—1983)所谓“阈限阶段”的典型场景。衣衫褴褛的战士与头裹青帕的苗民在山道上相遇,两种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历史转折点上产生了奇妙的共鸣。黎平会议会址内,侗族建筑特有的“吊瓜柱”支撑着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这种空间符号的叠合预示着新的文化叙事正在孳生。

遵义会议会址的建筑空间本身即成为符号重构的见证。这座原属黔军将领柏辉章的官邸,其新古典主义拱券与当地穿斗式构架的混搭风格,恰似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隐喻。当毛泽东在二楼东厢房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时,窗外的遵义老城正下着贵州特有的冻雨,这种“天无三日晴”的气候特征,此刻却成为掩护红军战略转移的自然屏障。

符号内涵重构在民间记忆中得到生动呈现。仁怀县苗族老人杨再礼回忆:“红军过茅台镇时,用银元买酒给伤员消毒,临走还在酒坛下压着钱。”这种经济交往中的诚信符号,与国民党“抓壮丁、派捐税”形成鲜明对比。人类学家庄孔韶在黔东南的田野调查发现,至今仍有村寨传唱着“红军哥哥踩新路,苗家木楼当客栈”的民谣,显示出革命记忆如何重塑地方文化符号。

三、新时代的符号再生产

“转折之城”的文化符号内涵,在新时代获得了多维拓展。遵义市将1935年红军卫生员龙思聪的故事进行现代演绎,打造的“红军苦萨”IP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这种将革命记忆与地方信仰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使红色符号实现了从政治叙事到情感共鸣的转化。大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轰鸣声与当年红军电台的“滴答”声形成历史回响,贵安新区苹果iCloud(云存储、云计算)数据中心的穹顶设计,暗合了侗族鼓楼的集体记忆符号。

交通体系的符号意义发生根本转变。县县通高速的“桥梁博物馆”不再是地理阻隔的象征,而是科学技术妙用自然的现代图腾。北盘江大桥565米的垂直高度,既刷新了世界纪录,也重构了“地无三里平”的传统认知。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附近性”概念,在此获得新解:天堑变通途不仅缩短了物理距离,更重要的是重塑了人们对空间的想象方式。

在生态文明的发展框架下,贵州文化生态优势的内涵价值被重新定义。黔东南“传统村落保护区”的吊脚楼群,从“落后”的能指转变为“乡愁经济”的载体。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在此遭遇地方性知识的修正:雷公山的云海茶田通过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既保持着农耕文明的本真性,又衍生出“云端生活”的现代意象。茅台镇将酿酒车间的工业景观与赤水河谷的丹霞地貌结合,创造出“看得见的生产过程”这一新型文化符号。

四、发展人类学的理论观照

从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视角观察,贵州的符号重构经历了分离—阈限—聚合的完整仪式过程。红军长征构成了分离阶段的“通过仪式”,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滞后可视为阈限期的阵痛,新时代的全面高质量发展则标志着符号聚合的完成。这种文化符号的转化机制,为发展人类学理解发展提供了非西方语境下的典型案例。

格尔茨的“深描”理论,在贵州实践中展现出新的维度。当苗绣纹样出现在巴黎时装周T台,当侗族大歌与电子音乐跨界混搭,这种文化符号的“意义之网”正在被重新编织。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提出的“全球文化流动”理论,在此呈现出独特的本土化路径:贵州不是被动接受全球化的同质化压力,而是主动将地方性符号转化为全球文化资本。

发展人类学的“象征资本”理论在此获得实证支撑。世界银行2018年报告显示,贵州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年位居全国前列,这种经济奇迹的背后是文化符号资本向物质资本的持续转化。从“三无”到“三变”(变资源为资产、变资金为股金、变农民为股东),符号内涵重构始终是发展实力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将文化符号视为生产要素的理论突破,为后发地区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新范式。

站在苗岭之巅回望,贵州的符号内涵嬗变史恰似一部微缩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从被书写的客体到自我言说的主体,从地理的边缘到精神的中央,这种文化符号内涵的重构过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发展人类学真理。那就是区域发展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竞赛,而是文化符号体系持续再生产的社会过程。当赤水河畔的酿酒匠人将红军渡口的记忆揉进酒曲,当FAST天眼在布依族歌谣中搜寻宇宙脉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省份的崛起,更是一种文明自我更新的密码。这种符号内涵重构的动力学机制,或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具启示性的文化注解。

（作者单位：凯里学院）

从「三无」之地到「转折」象征

贵州文化符号内涵重构及其高质量发展

□ 麻勇恒

黔东南州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产业化路径与IP运营研究

□ 吴绍敏 杨胜华 聂斌 姜梁娣 张培端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肇兴侗寨考察时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黔东南州既拥有世界级的非遗资源,又形成了村超、村BA、村T等群众自发创造的文化体育品牌。把这两类资源接入同一产业链条,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产,是黔东南推进“两创”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本文以赛事品牌与非遗产业的融合实践为对象,分析民族文化产业化与IP运营的基础、成效与薄弱环节,并就下一步的路径选择提出建议。

资源禀赋与群众首创相互叠加,民族文化产业化具备独特基础。黔东南州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建设单位,侗族大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56项,78处,数量居全国同级地州市前列,苗绣、蜡染、芦笙、银饰锻制等技艺在县乡村三级仍然保持着活态传承。与这一存量相对应的,是群众自发创造的文化体育品牌。村超、村BA以及随后兴起的村T依托互联网传播走向全国,参赛者和观众来自各地。两类资源分属不同领域,底层文化却相同,赛场上的芦笙演奏、侗族大歌、苗族盛装本身就是非遗的活态展示,赛事因此成为民族文化产业化最直接的流量入口。

黔东南赛事品牌的另一特征在于组织方式。政府提供场地、交通、安保等公共服务,村民自行组队、自行解说、自定村规民约,赛事不设商业冠名。品牌由村寨群体共同承载,不依赖单一网红代言,因而规避了人格依赖与生命周期风险,为长期的产业化开发和IP运营提供了稳定的主体基础。

政策层面的支撑同步增强。贵州省将民族文化传承弘扬纳入“四大文化工程”统筹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作出部署,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被列为重点任务。这些安排在保护端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利用端明确了方向,为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划定了政策边界。

文旅相互赋能,“两创”实践取得阶段性成效。“十四五”以来,黔东南州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持续增长,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提高,“村字号”赛事举办地的增速高于全州平均水平。榕江、台江等地新型经营主体成批涌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村集体收入和农户收入同步增加,赛事由一项群众性文化活动变成了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事件。

赛事带动正由节点性消费向常态化消费延伸。举办地组建消费精选联盟,把餐饮店与酒店民宿纳入统一的服务规范和优惠体系,以消费小票兑换购代金券等方式引导游客二次消费,参与商户的营业收入明显提升。住宿餐饮业由集中在赛期的阶段性经营转向常年经营,交通、物流、农产品加工等关联行业同步受益,赛事流量开始沉淀为县域的产业能力。非遗手工业同步走出以产养艺的路子。全州建成一批非遗工坊、非遗生活馆和文创孵化基地,开发可穿着、可食用、可体验的文创产品,把技艺转化为产品,把产品转化为收入。黎平侗品源传统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几名绣娘起步,现已开发多款苗绣染绣产品,取得多项专利,吸纳社员入社并带动周边妇女居家就业,让绣娘在农闲时节也能获得稳定收入。这类主体把分散的家庭技艺组织为有标准、有订单、有渠道的生产体系,构成了产业化的基本单元。

跨界译码验证了民族文化元素的市场价值。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将侗族大歌融入关键段落,以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模拟自然之声,随影片在海内外放映为广大观众所熟悉。这说明民族文化元素的价值实现可脱离原产地的地理空间,通过融入现代文化工业产品完成价值重构,也提示内容合作与IP授权是产业化的重要通道。

产业链条尚未完全贯通,IP运营存在薄弱环节。第一个薄弱环节在消费端。游客人次快速增长,人均花费的增长相对缓慢。赛事期间的非遗展演多以暖场形式出现,缺少成体系的体验产品与商业配套,游客消费集中于餐饮住宿等基础环节,看完比赛即离开的情况较为普遍。产业链条大体停留在基础消费层面,向文创设计、实景演艺、研学旅行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不足。

第二个薄弱环节在运营端。为保持赛事的群众性坚持不引入商业冠名,同时面临流量难以变现的现实困难。本土文化企业普遍不具备IP资产管理、版权运营与跨界授权能力,非遗数字化确权仍处于起步阶段,纹样库、声音库、影像库尚未形成体系建设。《哪吒之魔童闹海》与侗族大歌的合作由外部制作方发起,黔东南在其中承担素材提供的角色,未能进入版权收益的分配环节。

第三个薄弱环节在协同端。体育资源集中于榕江、台江,非遗资源富集于黎平、从江、丹寨、雷山、施秉,跨县域的线路串联与品牌整合不足,部分县域存在重复建设。核心传承人老龄化与青年劳动力外流同时发生,公司、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在部分环节偏松散,周期较长的传统节日难以转化为常态化旅游产品。

统筹与确权并举,夯实产业化运营的制度基础。州级层面宜建立文旅体旅系统统筹协调机制,把村超、村BA、村T的热度作为流量入口,串联侗族大歌、苗绣、蜡染等非遗资源,策划赛事与非遗体验相衔接的精品线路;培育实景演艺、互动工坊、非遗夜集等消费场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把一次性观赛转化为多日停留的综合消费。赛事本体守住群众性与公益性,配套产业交由专业化主体运作,形成前端保持原味、后端规范运营的分工格局。

数字确权是IP运营的前提。可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建设民族文化数字资源库,对代表性纹样、唱腔、工艺流程进行标准化采集与标注,形成可检索、可授权、可追溯的数字资产;制定非遗IP分级分类授权目

录,明确可授权范围、使用规范与收益分配规则,为影视、动漫、游戏、时尚设计等领域的合作提供制度接口。贵州已建成苗绣纹样数据库并对部分纹样完成版权登记,黔东南可在此基础上补齐本州特有的侗族大歌声资源与蜡染纹样资源。

产业化运营依赖复合型人才和公共服务。凯里学院、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已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参与院校,凯里学院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可在此基础上增设文化创意、版权运营方向的课程与实践基地,并与省内外设计机构建立驻村创作机制。州级层面可组建文化IP服务平台,为中小非遗工坊提供商标注册、版权登记、合同审查、渠道对接等服务,降低单个经营主体进入市场的成本。

培育主体与联结群众,让文化红利落到千家万户。市场主体决定转化效率。用好金融惠农政策,扶持一批具备设计能力与渠道能力的本土文化企业,支持非遗工坊向现代企业转型;引导产品开发对接当代生活方式,从旅游纪念品拓展至家居、服饰、办公、茶饮等日常消费场景,以设计溢价替代低价竞争。

利益联结决定转化的可持续性。推广保底收益、分红与劳动报酬相结合的紧密型联结机制,把产业收益落到村集体、手工艺者和普通农户。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实施名师带徒与青年返乡培育计划,通过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充实传承梯队。同时建立文化影响评估机制,对涉及仪式、节庆、图腾等核心文化符号的开发实行清单管理,防止过度娱乐化与同质化开发。

黔东南州已经证明,群众自发的文化实践能够产生全国性影响。下一步需要证明的是,这种影响能够沉淀为可持续的产业能力和稳定的群众收益。当赛事流量、非遗资源与市场主体在同一条产业链条上贯通,民族特色就能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此文为中共黔东南州党校系统2026年立项课题调研成果;作者单位:中共施秉县委党校）